

共生理论视阈下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发展分析

刘 眉

(重庆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发展意义重大。在区域国别差异大、跨文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即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普遍面临的核心难题。基于成熟的学术理论体系分析思考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稳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共生理论与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高度相契,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落地生根提供了理论依据、分析视角,有助于推动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落地生根。在共生理论视阈下,影响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因素主要可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大类。外在因素主要是两国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内在因素主要是海外国际中文教育自身的“三教”适应性问题。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要构建与当地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及教育资源共洽的共生环境,基于合适的共生模式,构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共生系统及自适应机制。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共生理论;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6-0051-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606

一、问题的提出

(一)有效开展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根本性问题是“适应性”

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设立以来,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经过2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在区域国别差异大、跨文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即如何超越文化冲突,融入当地社会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直是普遍面临的核心难题。“适应性”和“本土化”概念密切相关,但也有不同。“本土化”可以对应英语中的 Localization,即“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文化差异,主动适应当地民众多样化需求,通过培养本土师资、研发本土教材、开设本土课程等多种方式,持续推动孔子学院融入本土,特色发展,真正成为当地教育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目前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本土化”已有诸多研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通过输入主题词“中文”“本土化”或“当地化”等,共检索到848条期刊和学位论文,这些文献主要涵盖“本土化”的内涵、各种提法的比较(又称“本地化”“本土性”“当地化”或“在地化”)、实现的途径等,并且基本达成共识——国际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中文在当地

收稿日期:2024-11-30

作者简介:刘眉,女,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国际中文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20YH19C)。

“本土化”,实现“本土化”主要是从“三教”问题(教师、教材、教法)入手进行研究等。而“适应性”与“本土化”有所区别。“适应性”可以对应英文中的 Adaptation,主要指国际中文教育实现“本土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过渡性问题,即海外中文教育如何切入,包括海外国际中文教学机构(如孔子学院)影响力如何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悦纳度如何提高、外方持续合作意愿如何增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如何完成从推广到生根的蜕变等。多年来,我国孔子学院工作坚持聚焦本土化建设,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多的区域国别差异,首先解决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问题,这是实现“本土化”目标的逻辑起点和必由之路。为此,基于合适的理论体系并在其框架下分析思考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教学“适应性”发展问题,提升“本土化”过程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共生理论对于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追溯共生学说的历史,第一个提出生物界广义共生概念的是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家奠基人 de-Bary(1831—1888),他在1879年明确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2] Scott 明确地提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状态^[2]。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自然界内部、自然界与人类之间、人类社会之间,都有一种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共生理论逐步从生物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井上达夫提出,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 and 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3]⁴。在建筑学领域,黑川纪章就共生论提出著名观点,认为“共生就是在各种关系中,包括矛盾对立的关系中,建立创造性,在对立中给予对方必要的理解和肯定”^[4],他的共生论思想被认为是属于可以“向世界各个领域扩展的新思想”^[4]。在我国,袁纯清教授将共生理论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其著作《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对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和比较应用进行了深入阐释^[5]。胡守均教授的专著《社会共生论》在社会学领域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了社会共生的原因、共生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如何优化共生关系^[3]。苏长和在探讨中国大国外交中的共生文化内涵时也提出,共生不同程度地分布于人类文明的各个社会部分之中,正在成为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门类探索的共同主题^[6]。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形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5]¹。共生是人为建构的和谐目标,也是一种价值理念,能引导人们从彼此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以相互依存、共同成长理想追求。当今的共生理论已经形成共识,共生是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类群的密切联合、需求互补、共同发展、协同进化的能力^[7]¹,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普遍法则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共生理论对于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首先,共生理论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落地生根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演进,共生法则在多个领域得以运用和体现,并呈现出显著成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国际中文教育,旨在以语言为桥,促进中外语言交流、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独特作用,其实质在于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事实上,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在实践中也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共生理论的规律,它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播,更试图体现文化共生关系,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

其次,共生理论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合理的分析路径。共生理论的一般分析包含了本质、条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组织模式分析与比较、行为模式分析与比较。在进行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分析的时候,可以借助共生理论框架,深入探究海外国际中文教育与当地社会、文化、教育体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在实践过程中,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的实现受复杂因素的影响,运用共生理论可以从共生的宏观大气候——国际形势的因素、中观大环境——相关国家的政策和资源、具体小环境——学习的主客体状况等多个维度、多个关联因子的角度去解构分析,从中发现它们在共生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和不足因素,为国际中文教育最终在当地实现本土化提供借鉴和参考。这种解构分析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

逐步解决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的过程。

最后,共生理论的实践应用有助于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落地生根得以真正实现。当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走向国门,面向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者,进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必然面临“教需”契合、入乡随俗的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文教育的国际需求一直保持增长的总趋势,提升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对这种增长趋势也会产生积极作用。增强“适应性”必须考虑不同的区域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和教育发展水平,解决与所在环境共生的问题。胡守钧在《社会共生论》中深刻指出:“具有稀缺性的资源,是社会共生关系的主要纽带。”^{[3]43} 共生关系本质上还是关乎资源的交换。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在异国他乡的土壤上,必须构建与当地教育政策、汉语学习环境相互适应、和谐自洽的共生系统。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共生关系,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才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变动中保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尤其是当前,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步入从大规模数量建设向高质量内涵提升的关键时期,与所在国建立友好发展外交关系,加强政策的沟通与对接,满足其教育体制、外语政策和中文教学需求,精准服务不同国家中文学习民众,建立起扎根本土的国际中文教育自适应机制,最终形成海外国际中文教育良性共生的生态,是确保国际中文教育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也是国际中文教育健康长远发展的永恒追求。

二、共生理论视域下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按照前述影响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三大维度因素和关联因子,运用共生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大类。

(一) 外在因素

1. 两国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影响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大气候

中国与所在国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紧密,民意基础稳固,是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深度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外在动因。“汉语国际教育是一种‘国际敏感型’教育,是国际事态的‘晴雨表’”。^[8]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的深入推进,中国与共建国家在各领域的协同合作日益紧密,各国愈发认识到语言在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逐渐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语言互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及国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国际中文教育在其国家的接纳程度与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2. 相关国家的政策资源是影响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大环境

相关国家的政策资源作为宏观导向与坚实后盾,其配置与优化直接塑造了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如资金投入、师资培训、课程研发及文化交流项目等,都为国际中文教育铺设了宽广的道路。反之,政策的缺失或不稳定则可能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以沙特为例,沙特中文教育相对于很多国家起步较晚,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才有零星的中资企业开设中文教学项目。在 2019 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华之后,两国开启了深入合作模式,随后中文纳入了沙特所有教育阶段的课程中。2022 年 12 月,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教育部中文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将通过支持沙特高校中文专业建设、派遣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培训本土中文教师、支持开发教学资源、组织各类中文水平考试等方式,推动中文教育在沙特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沙特大中小学陆续开设中文专业和中文课程,学习中文成为沙特青年人的新时尚。卢旺达也是一个典型案例。2008 年卢旺达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此后中国持续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到卢旺达,不断激发民众学习中文的热情,中文已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从上述案例中不难看出,海外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是语言文化传播的结果,更是两国政策资源深度影响的体现。中国与所在国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互鉴,还深化了双方在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合作,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中文教育成为连接两国合作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

桥梁,彰显了共生发展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二) 内在因素

1. 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对象的学习需求和积极性,是影响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多维度、多层次地满足所在国中文教学对象的学习需求、激发其积极性,是驱动海外国际中文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关键。教育者首先需深入调研学习者的语言应用场景、文化背景及未来职业规划,以此为导向设计课程内容,增强“教需契合”,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力。其次,可以与当地中资机构合作,为教学提供实践平台与资源支持。中资企业作为中文应用的直接场域,可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使学习成果得以即时转化,形成“学用结合”的良性循环,有效提升学习积极性。第三,探索“中文+职业教育”模式,同时实施学(习)证(书)结合的方式,即通过认证体系为学习者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成果证明,增强其学习动力及市场竞争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中文教育的吸引力和实用性。

2. 国际中文教育的“三教”适应性是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核心

(1) 教师与当地民风民俗相适应问题

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方法、适应能力与整体素质是影响教学本土化的主导因素^[9]。在海外开展国际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汉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及具体实施者,与当地需求的契合程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当地汉语教学有效进行。教师深入了解当地民风民俗,能够帮助他们在教学设计中融入更多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内容,使汉语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更易于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同时,了解当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使教师更加灵活地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教育部公开发布的数据,目前全球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共 8 万多所,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 3 000 万,仅仅依靠国内派遣的汉语教师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同时,尽管国内派遣的汉语教师大多数都通过了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考核且教学能力突出,但同时也存在着任期限制导致轮换过快,所派出的教师在较短时期内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当地的教育政策、风土人情、文化差异等问题。相对而言,本土教师对于当地教育政策、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把握,以及对当地教育资源的占有都更具优势。

(2) 教材与当地认知水平相匹配问题

海外的国际中文教育要实现深层次的本土化,教材和教学资料必须参照所在国的教学规范,并贴合当地学习者的学习特性,包括学习的主动性、认知水平、学习速度等,这是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入乡随俗的重要要求。近年来,随着汉语学习者人数的不断增多,学习需求的多元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程度不高成为汉语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10]。目前汉语教材本土化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理论探讨、调查分析和实践策略方面,对于如何实现教材与当地学习者需求相适应的探究还非常有限。《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出台以后,一方面要基于标准的要求进行通用型教材的编撰和研发,另一方面可以在校本教材以及教辅资料方面针对多元文化和国情加强教材的适用性、实效性和针对性。除此之外,还应该思考教材的适用环境和使用对象的需求,研究学习者的特点,尊重学习者的差异。李泉在探讨汉语教材“国别化”的问题时指出,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应该“一体现,三贴近”:体现汉语汉字的特点及教学法,主要贴近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适当贴近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有限贴近海外学习者的生活和有关国家的文化^[11]。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需贴合本土思维和民众认知水平,为不同国别和对象“量身定制”教材,以提升教学质量。

(三) 教法与当地学情习惯相契合问题

教学方法与当地学情的契合也是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要注重的内在因素。目前,中国教育行业凭借其卓越的运营精细化程度和产品快速迭代能力,在出海拓展国际中文教育市场时,已经展现出明显的降维打击优势。然而,要将这一内在优势有效转化为实际的海外市场份额,仍需直面并应对一系列关

键挑战,尤其是目标用户(海外中文学习者)的拓展以及教学方法的本土化问题。在海外某些国家,中文学习的市场认可度和民众接受度不如其他主流外语(英语、西班牙语等),海外中文学习者在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学习习惯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要求中文教学应准确识别并定位学习者目标群体,如华人华侨子女、对中文有兴趣的外籍人士、希望与中国进行商务或文化交流的人群等,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精准对接,使中文学习更加贴近目标群体的兴趣和需要。

三、共生理论下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发展建构

(一)营造与当地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及教育资源共洽的共生环境

“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即共生模式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5]8}在海外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主体包括各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教学点及其他汉语学校、机构等,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是其中一个主体部分。孔子学院所在国与中国国际关系、教育政策、对汉语的需求构成孔子学院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间接环境,而孔子学院所在大学与国内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大学自身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等构成直接环境。在宏观层面,首先应加强中外政策沟通与对接,“国家政策是他国语言在本国传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2],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公开签署的声明文件对中文有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其次要在深入开展国情、民情、学情调研与相关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激发学生中文学习的兴趣与需求动能,寻求中文教学与学生个人发展需求的契合点。只有将中文人才培养融入当地国计民生,不断获得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接受与认同,才能有效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悦纳度。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利用中外合作协议、备忘录、声明公报、专项奖学金、联合科学研究、学术交流项目等形式,规范和深化双方各阶段在中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为当地中文教育各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持,形成中外多层次良性合作机制,构建国际中文教育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微观层面,孔子学院是建立在对方大学的,国内合作高校应尊重合作方的发展关切与合理需求,深化合作内涵,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合作意愿的持续增强,有力保障孔子学院的稳定发展。同时应立足当地,量体裁衣,为孔子学院发展精准定位;依托驻外中方机构和华人华侨,因地制宜地发挥孔子学院的纽带和桥梁作用,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扩大影响,增强办学活力,有效提升孔子学院的影响力。

(二)调适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即共生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袁纯清在论述共生模式时指出:“每一种类别的共生,都可能采用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或一体化共生(稳定的共同体)等四种具体组织模式。”^{[5]34}在最初级的“点共生模式”中,共生界面具有“生成随机性、介质单一性、界面不稳定性 and 共生非专一性”^{[5]35}的特点,这与国际中文教育最初进入某国或某区域时的状态非常相似。海外开展国际中文教育以孔子学院为主,最初孔子学院是在原国家汉办的主导下,中外双方合作大学达成一致的意向开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随机性(非国家层面主动安排,主要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就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只有1所或2所孔子学院,功能相对单一,与所在大学教育方面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极不稳定,共进化特征不明显,这样的共生模式唯一性水平很低,极易被忽略甚至取代。

当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加且不间断发生时,共生模式会进一步进阶到“连续共生模式”乃至“一体化共生模式”。连续共生模式的界面生成具有内在必然性,偶然、随机的作用已不可能产生连续共生的界面^{[5]40},而“一体化共生模式”即共生单元形成了具有独立性质和功能的共生体。在此高阶模式阶段,共生界面更加稳定有效,共生单元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持续顺利进行,共进化特征更为明显。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应努力达到“连续共生模式”,并最终实现“一体化共生模式”,后者是共生关系的最高级形式。在该模式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存在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与其所在国的母语

教学和其他各类外语教学多样互补、和谐共存,利益相互关照,体现出明显的共进化特征。例如,在泰国,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中文学习者从最初的数千人,快速增加到百万人,中文教学在泰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目前,海上丝路孔子学院已与泰国 62 所职业院校、8 所大学、2 所中学、1 所国际学校以及 1 所海外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与泰国科技部、东部经济走廊经济特区委员会、旅游部、泰国青少年家庭法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联络建立了全球第一家“鲁班工坊”和海上丝路·帕那空皇家大学孔子学院。以海上丝路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泰国国际中文教育,已构建起与泰国国民教育连续共生模式。在泰国开展汉语教学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选择性,共生界面稳定而均衡,共生专一性水平高,有较强的共进化作用,有利于促进泰国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 构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共生系统及自适应机制

“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13]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进国际中文教育的落地生根,必须契合当地的人文生态,必须与合作方实现良性互动,形成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构建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共生系统。共生系统是指“由共生单元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和共生类型构成的共生关系的集合”,具有“多重性、共进化性、不可逆性和自主增容性”^{[5]58}。“多重性”是指构成共生系统的各个单元形成了多维立体的交互关系,其根源在于多重利益方的深度捆绑。“共进化性”即共生单元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的。海外开展国际中文教育不能只着眼于自身发展,应从尊重合作双方的核心需求出发,寻求效益最大化,以共生共赢强化办学合力,确保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稳定发展。“不可逆性”表现在“任何共生单元一旦进入共生系统,不论从哪种模式和哪种类型发生,其进化发展都会与共生系统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当其退出该系统时,不可能还原到原有状态,而总是留有共生系统的烙印”^{[5]58}。与此同时,共生系统还具有“自主增容性”,包括维度和密度的增容,它反映出和谐统一的共生系统内在的无限张力。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就在逐步探索中文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系统。实施“中文+职业技能”的结合,将中文学习和职业生涯出路深度关联,最符合非洲地区汉语共生系统建立的实践操作需要。在这样的模式下,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持续健康、蓬勃发展,注册学员数量持续增加,已累计近 5 万人次,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注重与外界建立共生系统的同时,海外国际中文教育也应该不断反观自身,依据环境需要主动进行调整,建立一种自适应机制。包括提升国际中文教师与当地需要的适配度、教材与当地需求的适应度、教法与当地学情的契合度。在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全球不同国别区域的教育教学共生机制比较研究,构建“一洲一案、一国一策”的特色教学模式,探索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与当地教学有机融合、和谐共生。

四、结 语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倡议的背景下,针对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扎根本土的难点问题,我们应在顺应国情、民情、学情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着力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共生机制,以增强适应性,助推本土化。一方面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一般规律的具体化,确保教育教学的针对性、适应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共生现象法则,认识海外国际中文教育与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从而深入思考和把握海外国际中文教育的适应性问题,推进其向本土化发展,实现国际中文教育落地生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 [1] 田学军. 在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J]. 孔子学院, 2018(01): 66-67.
- [2] 洪黎民. 共生的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1996(04): 50-54.

- [3] 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第2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4] 纳日碧力戈. 万象生态观辨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61-66.
- [5]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6] 苏长和.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1):5-25+156.
- [7] 刘润进,王琳. 生物共生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8] 李宇明,李秉正,宋晖,等.“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上)[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04):1-11.
- [9] 李丹. 影响孔子学院教学本土化的主要因素:分解与测量[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87-93.
- [10] 李宝贵,李慧,璩大盼. 四十年间国际中文教材研究的热点、趋势与特征[J]. 汉语教学学刊,2020(00):118-137.
- [11] 李泉. 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J]. 世界汉语教学,2015(04):526-540.
- [12] 吴晓文,吴应辉. 世界各国中文传播政策类型及其影响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01):212-222+240.
- [13] 吴应辉. 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全球性语言特征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J].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4(02):1-12+213.

An Analysis of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Liu Me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issue of adaptati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amely how to integrate into local societies and take root, blossom, and bear fruit, is a core challenge universally faced in the context of significant regional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cross-cultural background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and think about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mature academic theory system. The symbiosis theory aligns closely with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its successful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ing roots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primarily encompass bilate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le internal factors mainly pertain to the “three educations” adaptability issue within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tself.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irst and foremost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mbiotic environment that harmonizes with local educational systems, frameworks, and resources, the selection of an appropriate symbiotic mod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mbiotic system and adaptive mechanism for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ymbiosis theory; adaptation

[责任编辑:陈忻]